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國佛教
版畫全集

中國書局



中國佛教版畫全集

目錄卷

翁連溪 李洪波 主編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盛
世
大
觀



傳
印
敬
題



恭賀中國佛教版社全集出版

澗相莊公殿



壬辰夏滄陽法溪王正齊志遠敬頌





中國佛教版畫全集
目錄卷



中國佛教版畫全集編委會

顧問

釋傳印 釋永信 釋延藏 金維諾 李際寧 李陽泉 李之檀 李致忠
倪曉建 潘建國 王志遠 韋力 章宏偉 周心慧 何勁松 鄧德恒

主編

翁連溪 李洪波

副主編

于華剛 宮楚涵 毛景嫻 袁理

責任編輯

辛迪 孟進軍 王亞

編委會

艾斯仁 陳東 陳湛綺 馮德堡 韓禪學 洪定偉 黃河 黃燕生 經莉 孔令琪
李國慶 李嘉波 李美琦 劉薈 劉俠 劉繼輝 劉建章 呂敬人 羅琳 馬建農
馬文大 孟錦 石光明 宋平生 譚平 佟澤民 汪國光 王德 王洋 王水衷
辛迪 楊建 俞冰 張紅兵 張曉東 趙前 鄭宏麗

特約編輯

陳亞芬 高國普 黃彥博 馬林娜 秦琪 魏晨 吳雪嬌 鄭美霞

策劃

華典偉業圖書有限公司



出版說明

版畫是我國文化藝苑中的瑰寶，它的出現不僅豐富了我們的藝術形式，更重要的是它以直觀的形象語言，與文字語言相配合，以圖文并茂的形式對促進我國的文化傳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自它出現以來，思想敏銳的文化傳播者們就迅速把它應用到自己的文化領域，充分發揮這種令普通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宣傳思想，鼓吹文化。其中利用最廣泛，取得成果最突出的當屬佛道教，尤其是佛教。佛教利用版畫傳道布教的歷史與版畫產生、發展、繁榮的歷史相始終。所以研究中國的版畫藝術與版畫歷史，佛教版畫都是繞不開的一大重鎮。但是衆所周知，這些佛教版畫收藏于中國乃至世界各地的藏書機構，研究者要想搜輯齊全這些版畫非常不易，這就給佛教版畫研究造成一大障礙，非常不利于研究的發展。我們出于方便研究、保存善本的目的，籌劃編纂《中國佛教版畫全集》一書，始于一九〇五年，由專家起草目錄初稿，按目錄初稿搜集各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各類型版畫資料，亦有各類古籍經營機構及寺院所藏之法寶圖像，其中世所罕見、各類版畫史圖集未收之本達十之八九。

搜輯到版畫資料後，我們用專業圖版複製工具將版畫一一複製，之後由專業的製版專家對圖片一一修整，力求在保持原貌的基礎上使圖版清晰。二〇一一年，該項目列為中國書店出版社重點出版項目，并申報國家出版基金，按照當時的規劃，該書為八開五十冊，計劃二〇一二年四月印製出版。在列入國家出版基金項目後，我們在資料的收集、版畫年代的認定以及版式的製作等方面，都更為嚴謹和精益求精。在進行排版、編輯的同時，我們繼續搜集海內外珍稀資料，于一九〇一年年底又陸續搜集到了臺灣及國外的一批版畫資料，并得到相關專家的論證。隨着資料搜集的更加全面造成版面的增加，從五十冊擴充為六十冊，又擴充為八十冊，使得本書的最終印製時間不得不屢次延遲。經歷八年的資料收集和製作過程，共搜集近三萬幅版畫，文獻近三千種。

本書所收文獻，上起北周，下至民國。編排體例基本按年代排列，力求能較全面地再現中國佛教版畫史的發展脈絡。刊刻年代以文獻中所體現的版刻最末時間為準，主要依據牌記所題的刊刻時間、序跋的撰成時間、文獻所收內容的最末時間等。如無明顯時間線索則按照版畫的時代風格特徵或根據史料考證其大致年代，以求每種文獻都有其刊刻年代，方便學人參考研究。為使讀者對全書框架有較全面的瞭解，編委會特製作一簡明目錄，列于後：

第一卷，北周、唐、五代、宋初版畫

第二卷，宋初至宋末的佛教版畫

第三卷，遼、西夏版畫

第四卷，金、元代版畫

第五卷，明洪武、建文、永樂年間版畫

第六卷，明洪熙、宣德年間版畫

- 第七、八卷，明宣德年間版畫
- 第九卷，明正統年間版畫
- 第十卷，明景泰年間版畫
- 第十一卷，明天順、成化年間版畫
- 第十二卷，明成化年間版畫
- 第十三卷至十六卷，明成化本《釋氏源流》
- 第十七卷，明成化《釋氏源流》版畫加彩本
- 第十八卷，明本《萬像水陸》《水陸道場神鬼圖像》
- 第十九卷，明弘治、正德年間版畫
- 第二十卷，明大興隆寺本《釋氏源流》及嘉靖年間版畫
- 第二十一卷至二十三卷，明嘉靖本《佛母大孔雀明王經》
- 第二十四、二十五卷，明嘉靖本《釋氏源流》
- 第二十六卷，明隆慶、萬曆年間版畫
- 第二十七卷至第三十卷，明萬曆年間版畫
- 第三十一至三十四卷，明萬曆本《釋氏源流應化事迹》
- 第三十五卷，明泰昌、天啓年間版畫
- 第三十六卷，明天啓、崇禎年間版畫
- 第三十七卷，明崇禎年間及南明版畫
- 第三十八卷，清順治、康熙年間版畫
- 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卷，清康熙年間版畫
- 第四十二卷，清雍正年間版畫
- 第四十三卷至四十八卷，清乾隆年間版畫
- 第四十九卷，清乾隆年間《三百佛像集》
- 第五十、五十一卷，清乾隆年間《滿文大藏經》版畫
- 第五十二、五十三卷，清嘉慶年間版畫
- 第五十四、五十五卷，清嘉慶本《釋迦如來應化事迹》
- 第五十六卷，清道光、咸豐年間版畫
- 第五十七、五十八卷，清同治年間版畫

第五十九至六十三卷，清光緒年間版畫

第六十四、六十五卷，清光緒本《佛祖統系道影》

第六十六、六十七卷，清光緒七年本《釋迦如來密行化迹全譜》

第六十八、六十九卷，清光緒三十三年本《釋迦如來應化事迹》

第七十卷，清宣統年間版畫

第七十一、七十二卷，民國時期版畫

第七十三卷，民國本《佛祖道影》

第七十四卷，《般若八千頌經》及歷代單張佛、金剛、菩薩像等藏傳佛教版畫

第七十五卷，《佛陀十二宏化圖》《釋佛十五神變圖》以及藏傳佛教歷代宗師像

第七十六卷，藏傳佛教《五百佛像集》及陀羅尼、吉祥符等版畫

第七十七卷，藏文經版畫

第七十八、七十九卷，歷代民間佛教故事版畫

第八十卷，《玉歷原始》《玉歷鈔傳警世》等版畫

爲使普通的版畫愛好者瞭解版畫歷史，我們還收錄了周心慧先生的專著《中國佛教版畫史略》，編爲一卷，此外，爲方便檢閱，我們製作了以經題及收錄內容爲搜索詞的總目錄一卷，加上正文八十卷，共八十二卷。

《中國佛教版畫全集》集千年佛教版畫之大成，是系統地瞭解中國佛教版畫藝術和版畫歷史的重要資料，對於研究佛教及中國傳統文化亦具有重大意義。我們衷心希望，本書能物盡其用，在相關文化領域發揮出它應有的作用。

《中國佛教版畫全集》編委會
二〇一四年一月

凡例

- 一、《中國佛教版畫全集》共八十二卷，史論一卷，目錄及序言一卷，圖版正文八十卷。
- 二、《中國佛教版畫全集》編選原則以佛教經、律、論插圖，獨幅佛教內容版畫為主，也適當地甄選了一些佛寺志、地方志、山水志、詩文、小說、畫譜等與佛教相關的版畫。
- 三、《中國佛教版畫全集》第七十四卷至七十七卷為藏傳佛教部分，甄選精品版畫影錄其中。第七十八卷至七十九卷為寶卷。第八十卷為玉歷寶鈔。此三部分內容均是以佛教文化為基礎的變異，是佛教版畫藝術的另一種延伸，故收錄部分經典作品。
- 四、《中國佛教版畫全集》所收文獻上起北周，下至民國。編輯順序按年代排列，力求再現中國佛教版畫發展脈絡。刊刻年代以文獻中所體現版刻最末時間為準，時間不詳的根據史料考證著錄其大致年代。
- 五、正文每卷分為四個部分：一為本卷所收經典詳細目錄，包括經名、年代及在本卷具體頁碼；二為敘錄，本卷代表性版畫之簡介；三為正文版畫及版畫相關佛教經文；四為圖版說明，是對刊印版畫所呈現內容的詳細闡述及注釋，包括經名、年代、版本、刊刻人、作者、譯者、裝幀、尺寸、館藏等相關信息。
- 六、經題擬定時，均以原刻卷端經名為準，無經名的錄題簽，無題簽的根據經文內容命名。無從考證的版畫則自擬標題。
- 七、所收版畫明確出自某部大藏經的，命名以今天通稱為準，先標「某某大藏經」再著「經題」。例如「乾隆大藏經 傳法正宗定祖圖」。以易于檢索。
- 八、《中國佛教版畫全集》收錄部分佛教內容的綫描、石印、銅版及其他版本形式的畫幅，也有域外翻刻的版畫經典。收錄者皆為前代有刊刻記載，而今祇有上述摹本存世，錄之以補其缺。其數不過十種。

中國古代木刻版畫的發展及其成就簡述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印刷術的國家。印刷術的發明，把人類文化推向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版畫是通過繪（創作畫稿）、刻（製版）、印（印製、印刷）而完成的繪畫作品。由于民間刻工的參與，版畫又常具有民間美術的特色。版畫作為印刷術的一個重要方面，可作為獨立的藝術品欣賞，也可圖文互補，作為圖解文字之用。它不僅傳播藝術，同時也傳播歷史文化、科學知識。版畫對於普及、發展科學和文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版畫在中國，從唐初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發展歷史，無論是雕版、活版、彩色套印，在世界都處於領先地位。流傳至今的大量版畫作品，涉及眾多的學科領域，社會功能廣泛，影響深遠，是我國非常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創造力。

早期的佛教版畫——唐五代

中國版畫的發展，以佛教版畫出現最早。唐代的佛教受到統治者的大力推崇，唐太宗、武則天及唐憲宗均曾極力宣揚佛教，其影響力遍及全國。佛教版畫遂得以大量印製并向民間發散，大大加速了佛教的普及。關於最早刻印版畫的文獻記載，唐代馮贄《雲仙散錄》引《僧圓逸錄》：「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于四方，每歲五馱無餘。」這當是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六四五）玄奘由印度回國以後的事。所印普賢像用五匹馬馱運，可見每年所印佛像版畫絕非少數。這與新出土的其他內容的版畫實物對照，證明木刻版畫起源于唐代初年。另一方面，這些普賢像雖沒有片紙留下來，但說明在初唐已有大規模的佛教版畫刊施活動（可能是捺印）。

中國古代版畫，以木刻雕版版畫為主，屬於凸版印刷。佛教認為修建寺廟、佛塔，塑繪佛像、禮佛供養、講寫讀誦佛經，以至口稱佛名、兒童聚沙為塔等，都是修功德的具體方法；而刻捺印佛像是最簡易而見實效的方法。在唐代，富裕人家更請專人刻印高水平的佛像佛畫，因此隨着佛教的興盛，刻印佛像版畫的風氣迅速得到發展。

玄奘由印度回國之前唐貞觀十七年（六四三），王玄策奉詔出使天竺，畫家宋法智隨行，携歸大批印度佛畫，另帶回佛模四顆。唐高宗李治咸亨二年（六七一）冬，僧人義淨取海道入天竺，經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在歸國途中，撰寫了《南海寄歸內法傳》，于天授二年（六九一）寄歸。該書卷四云：印度「造泥製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絹紙，隨處供養」。說明初唐時，捺印佛像之法亦曾流行于印度。捺印佛像在我國甘肅敦煌、新疆等地都有發現。捺印佛像是一種小型版畫，屬於圖章與版畫之間的過渡形式。它的雕版比較小，有的還可能有把柄。印製方法近似蓋圖章，用手捺印，簡便易行。捺印佛像始于唐，盛行于五代時期。但以五代時期的刻印遺存最多，在敦煌、新疆吐魯番等地，甚至連中亞地區都有發現。捺印不僅印佛像，也印菩薩、地藏、金剛力士等。有的印于《佛名經》上每個佛名號的上方，有的橫豎成行印成千佛。刻印目的是隨身供奉，或進獻佛像前，或修功德，或隨葬求佛保佑。

版畫的起源與雕版印刷是分不開的。雕版印刷術起源于唐代初年，明人邵經邦在《弘簡錄》卷四十六中，記載了唐太宗李世民命令刻印長

孫皇后所撰寫的《女則》十篇的史實。一九六六年在韓國慶州佛國寺釋迦塔中，發現一卷《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為木刻雕版印刷品，經文中，有武則天在位時造的「地」「初」「授」「證」四字，和歷代寫法不同，證明此件是武則天在位時刻印，後傳入新羅王朝的。關於木版刻印佛經，吐魯番出土有漢麻紙刻印《妙法蓮華經分別功德品第十七》，有武則天時所創新字，亦為初唐印製。目前在中國發現最早的版畫，是在陝西省西安市發現的文字與圖像結合的《梵文陀羅尼經咒》殘片，除環繞排列的梵文外，還有星象、蓮花手印、金剛杵等圖像。考古工作者根據同時出土的文物判斷，認為是公元七世紀印本。

在西安另一座唐墓中出土的《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比較完整，漢文經咒十八行按順時針方向環繞排列，中間圖像為手繪，外周為手印圖像，經專家判斷為公元九世紀印本。其次是一九四四年在四川成都發現的《梵文陀羅尼經咒》，中間為六臂菩薩像，四周為佛像及蓮花手印圖案。在畫面右側題「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近下……印賣咒本」，唐肅宗至德二年（七五七）成都改稱「府」，此經咒印行當在此年後不久。一九九六年陝西西安唐墓出土《陀羅尼經版印咒本》六件。這種梵文陀羅尼經咒在陝西西安、四川成都都有發現。如西安發現的一件，根據相關文物判斷其刻于七世紀，而另一件刻于九世紀。題有「成都府龍池坊」及「浣花溪報恩寺」的兩件經咒，均刻于唐肅宗至德二年（七五七）成都改成府之後。陀羅尼是古印度語的漢文音譯，是「總持」的意思，即經文的核心內容。刻印經咒的目的是為求康泰平安、死後升天。梵文經咒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實物例證。

近年來，陝西省歷史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等，都徵集到不少新發現的陀羅尼經咒版畫。江蘇鎮江、河南洛陽出土的《梵文陀羅尼經咒》為五代時期的作品。宋代的《陀羅尼經咒》，有的梵文與漢文并存，甚至全部為漢文，但仍保留經咒的基本形式，畫面結構更富於變化。圖像有佛、菩薩、大隨求菩薩以及各種佛教法物。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捺印千佛像朱、墨兩種印本，均出自敦煌，為歸義軍時期（八四八至一〇〇一年，唐時，敦煌名沙州。安史之亂後，吐蕃占領河西地區，敦煌在被圍困長達十年的情況下，最後不得已作有條件投降。八四八年，敦煌人在張議潮率領下起義，推翻吐蕃統治，重新回歸唐朝。唐朝設立歸義軍，張議潮成為歸義軍節度使。此後一共延續了一百五十三年）作品。朱印本長一百二十五厘米，橫排八行，像高約三點五厘米。墨印本長八百零八點九厘米，橫排五行，像高約五厘米。俄、英、法也各藏一卷。英國一卷印有四百六十八尊小佛像。

一九〇〇年發現于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唐《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軸裝，用七張紙連續黏接成爲一卷，版畫框高二十三點七厘米，寬二十八厘米，全長四百八十七點七厘米。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發現後劫往英國，現藏大英博物館。此經卷首有一幅精美的扉畫，描繪釋迦牟尼佛于祇樹給孤獨園為長老須菩提及僧眾說法。佛端坐蓮花座上，妙相莊嚴，神態怡然。兩天女駕雲飄然而來，須菩提右膝着地合十向佛。佛左右為護法天神，四周環立衆生和施主。根據經卷末「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的刊刻題記可知，該版畫是八六八年的作品，是武宗滅佛二十三年後刻印的。這是全世界有確切紀年的最早的版畫，它較歐洲現存最古老的木版版畫——一四二三年刻印的《聖克利斯道夫像》要早五百多年。

絕大部分的唐、五代佛教版畫，發現于甘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而留在中國國內的，僅是當時所發現文物中的一小部分。大唐盛世以後，藩鎮割據，形成了五代十國的分治局面。從五代版畫簡單、明快、勁健的風格，可以看出，當時雕鏤技法已相當進步。敦煌發現的五代時期版畫較多，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雕印《大聖毗沙門天王像》，粗麻紙印造。版框通高三十九厘米，寬二十六厘米。上圖下文，圖高二十七厘米，

文高十二厘米。毗沙門天王屹立正中，戴寶冠，佩長劍，鐵甲披肩，右手執戟，左手托塔，吉祥天女捧花果侍立于右，羅刹右手高舉嬰兒，一童子立左側。圖像下豎刻：「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主領天下一切雜類鬼神，若能發意求願，悉得稱心。虔敬之徒盡獲福祐，弟子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譙郡曹元忠請匠人雕此印板。惟願國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樂。于時大晉開運四季丁未歲七月十五日紀。」可知其為九四七年，由敦煌地方長官曹元忠主持刻印。歸義軍節度使押衙楊洞芊雕有《大聖普賢菩薩》，上部刻普賢騎象，左右有天女及侍從，右刻「大聖普賢菩薩」，左刻「普勸至心供養」等文字。下部刻「弟子歸義軍節度押衙楊洞芊敬發誠志雕此真容，三十二相俱全，八十之儀顯赫。伏願三邊無事，四塞一家；高峰常保于平安，海內咸稱于無事……」（共十一行字）。此外還有《四十八願阿彌陀佛》《大聖地藏菩薩》以及道照雕刻的《千手觀音曼荼羅》等。此外還有不少藝術水平很高的版畫，如《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麻紙印，紙高三十二厘米，寬二十點五厘米。上圖下文，像框高二十厘米，寬十三點五厘米，菩薩及蓮座高十七點五厘米。菩薩像墨印彩繪，上部經幢、蓮花、衣襟紅色，褲紅色，綠色縹帶，足下蓮座朱墨相間。菩薩像兩邊各一立柱，右柱刻「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左柱刻「歸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傅曹元忠造」。圖下刻「弟子歸義軍節度瓜州等處……曹元忠奉為城隍安泰，闔郡康寧。東西之道路開通，南北之凶渠順化。勵疾消散，刁斗藏音。隨喜見聞，俱沾福祐。于時大晉開運四年丁未歲七月十五日紀」。曹元忠另外雕印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麻紙印造，書高三十三點六厘米，寬十厘米。版框高十二點二厘米，寬八點八厘米。卷尾刻「弟子歸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譙郡開國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己酉歲五月十五日記」。全經最後半頁殘，左上一圓柱形，柱下刻「雕版押衙雷延美」，右版畫，已模糊不清。按天福無十五年，而已酉實為後漢乾祐二年（九四九）。

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博物館都珍藏有出自敦煌莫高窟五代時期雕印的《文殊師利菩薩像》，麻紙印造，也是上圖下文的形式。上圖部分各鑄繪雙邊長條狀匾聯，右鑄「大聖文殊師利菩薩」，左鑄「普勸志心供養受持」，中間鑄印文殊師利菩薩像，圖下鑄刻文字十三行：「此五臺山中文殊師利大聖真儀，變現多般，威靈叵測。久成正覺，不捨大悲。隱法界身，示天人相。與萬菩薩住清涼山。攝化有緣，利益弘廣。思惟憶念，增長吉祥。禮敬稱揚，能滿諸願。普勸四眾，供養歸依，當來同證菩提妙果。文殊師利童真菩薩五字心真言：阿、囉、跋、左、曩。文殊師利大威德法寶藏心陀羅尼：唵、阿、味、囉、吽、佉、左、略。對此像前，隨分供養。冥心一境，專注課持。回施有情，同歸長樂。」此外大英博物館、大不列顛圖書館東方部還藏有出自敦煌藏經洞的唐晚期刻印的三尊佛像版畫、觀世音菩薩像版畫，以及五代刻印的地藏菩薩像版畫、普賢菩薩像版畫、千幅陀羅尼輪版畫等。

吳越國地處江浙閩地區，都城在杭州，經濟繁榮。吳越從錢鏐到錢弘俶，三代都崇奉佛教。尤其是錢弘俶，建塔造寺，廣印經卷，普施天下。錢弘俶受封天下兵馬大元帥在後周顯德元年（九五四）秋七月。『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弘俶』刻印的《寶篋印經》，經小而印數頗多，且有多個版本。杭州雷峰塔發現有開寶乙亥本（九七五），刻工略顯粗糙，卷首題「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弘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捨入西關磚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記」。雷峰塔還發現有太平興國元年（九七六）王承益刊《塔圖》版畫，未見發表。一九一七年在湖州天寧寺石幢象鼻發現顯德丙辰（九五六）本《寶篋印陀羅尼經》二卷，卷前有刻經題記四行，題記後為禮佛圖，圖後為經文，正文行八、九字不等。一九七一年安徽無為縣宋舍利塔下磚墓木棺內發現同樣經卷。一九七一年于紹興縣城工地發現《寶篋印經》乾德乙丑（九六五）本。錢弘俶還雕造《應現觀音像》，上圖下文，真言凡二十四行。當時吳越國的一些高僧，如延壽等也刻有佛經及「彌陀塔圖」十四萬紙，吳越國水心禪

院住持道誦雕《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傳》。

吳越版畫現今能見的祇有此數例，有文字記載的由高僧延壽刊印的《彌陀經》《楞嚴經》《法華經》《觀音經》《佛頂咒》《大悲咒》等佛畫則未見傳世，其他刊施行動也因史料失載而湮沒無聞。但吳越曾據天下勝境，又大力崇佛，相信境內的佛畫在數量及質量上，均遠逾前代。

佛教版畫的發展和興盛期——宋

宋元時期（九六〇—一三六八），包括遼、金、西夏在內的四百年間，是中國宗教版畫相當興盛的時期。當時的宗教版畫不僅作品數量多，成為當時版畫的主流，而且藝術水平高，甚至後期的晚明戲曲小說版畫也未能超越。

宋朝從太祖趙匡胤開始，歷朝大多重視佛教。加之宋代的刻書業比較發達，所以刻印佛經的風氣盛行，宮廷、官署、寺院、坊間均有刊刻。據《佛祖統記》卷四十三記載，于開寶四年（九七一），敕高品、張從信等，到當時的印刷中心益州（今四川成都）組織雕印我國第一部大藏經。至太宗趙光義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九），「成都先奉太祖敕造大藏經版成進上」，刻印大藏經大約花了十年的時間完成。總卷數達六千六百卷，被稱為《開寶藏》，因刻印于四川，故又稱《蜀本大藏經》。其後又陸續補版，流布于海內外。北宋福建東禪院刻印的《崇寧藏》，始刻于神宗元豐三年（一〇八〇），徽宗崇寧三年（一一〇四）全部刻成，歷時二十五年，是北宋時期民間刻印的我國第一部私刻大藏經。隨着刻經的盛行，佛經刻印扉畫或插圖也大大增加。有很多專職的畫家繪製畫稿，如高文進，家中幾代人都是繪製寺觀壁畫的高手。同時刻版印刷的技術隊伍也不斷壯大，在實踐中技術不斷提高。一九五四年日本京都清涼寺修佛像時，發現了四幅極為精美的獨幅版畫，是太宗雍熙年間（九八四—九八七）的作品。《彌勒坐像》，題「待詔高文進畫」；《越州僧知禮雕》，當刻于杭州。《文殊騎獅》《普賢騎象》兩幅版畫也很精美。這些都是北宋時期日本僧人齋然在中國時，將其封藏于佛像內帶回日本的。

民間流行的佛教版畫，大多為能工巧匠所為，以綫描為主體，多採取圖解的形式，畫幅衆多，如《文殊指南圖贊》《金剛經感應傳》，畫幅達數十幀。而構圖簡練，風格質樸而又富于變化。經咒版畫北宋時仍有出現，多發現于四川、陝西。但內容已複雜。一九六八年在山東莘縣宋塔內發現的四種七卷本的《妙法蓮華經》，分別是北宋仁宗嘉祐時期（一〇五六—一〇六三）和神宗熙寧時期（一〇六八—一〇七七）的作品，為杭州錢氏、晏氏家族所刊刻。錢氏家族是吳越國王錢弘俶的後代。四種七卷本，每卷各有版畫，并有刻工垢、念、葉柱、吳鈐的題名。為刻版書寫經文的，題「琅邪王遂良書」。

美國哈佛大學佛格美術館，一九六二年入藏的《御製秘藏詮》四幅山水圖版畫，是我國最早的山水版畫。佛教版畫由表現佛、菩薩，發展到表現山水自然景色，點綴以僧侶們的活動，是佛教版畫的重大變革。山水版畫在佛經中出現，更是難得的珍品。《秘藏詮》經文為宋太宗趙光義御製，據所印木記可知，版畫為徽宗大觀二年（一一〇八）重印《秘藏詮》經文時補入，是《開寶藏》中所見的獨有版畫作品，也是大藏經中附有版畫插圖的開創。這可能是與宋徽宗喜好繪畫，并設畫院積蓄和培養繪畫人才有關。

南宋間流行于民間的佛教版畫，深入到基層的人民群眾，如嘉定時期（一二〇八—一二三四）的《天竺靈籤》、紹定間（一二二八—